

·校勤学·

论校勤学上的零度与偏离法则

——《王子年拾遗记》异文释例

林 嵩

内容摘要:零度与偏离学说不仅适用于语言学领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原则,也可运用于校勤学的异文分析中。本文以《王子年拾遗记》一书的校勘为例,具体说明如何运用零度偏离法则推求异文、梳理版本源流、辨析避讳字。

关键词:校勤学 零度偏离 《王子年拾遗记》 异文 避讳

“零度”与“偏离”本来是修辞学中的一对概念。例如,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创始人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是把“平实地运用”的语言视为“零度”,而把内容或形式上的修饰一律称为“畸形的状态”(此处的“畸形”也即“偏离”的意思)^①。国内近年对这一学说做过系统阐释的当首推王希杰。王希杰特别强调,零度与偏离理论是古今中外共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可适用的范围并不限于修辞学与语言学领域;研究者应该努力使这种无意识的观念转变为自觉的方法^②。

本文即尝试将零度偏离学说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运用于校勤学的异文分析中。实际上,在以往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已有学者践行了这一法则,王希杰也做过初步的总结。在下文中,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对“零度”与“偏离”这对概念及其在校勤学领域中有何体现,做简要的阐释。而后,我们将以《王子年拾遗记》一书的校勘为例,对如何运用零度偏离法则进行异文分析做具体说明,

①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五篇第一节):“语言文字的固有意义,原是概念的、抽象的,倘若只要传达概念的抽象的意义,此外全任情景来补衬,那大抵只要平实地运用它就是,偶然有概念上不大明白分明的,也只要消极地加以限定或说明,便可以奏效。故那努力,完全是消极的。只是零度对于零度以下的努力。”又(第三篇第一节):“此外大抵或者偏重内容,或者偏重形式,有些畸形的状态。不过内容偏重的畸形是一种上升的畸形,形式偏重的畸形却是一种没落的畸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新2版,第70、40页。

②王希杰:《作为方法论原则的零度和偏离》,《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11-117页。

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一、零度与偏离法则在校勘学中的体现

同一段文本,在不同的书籍或相同书籍的不同版本中,其文字表现可能略有差异:这种差异性的文句,形成了校勘学中的“异文”。一个人只要他足够细心,发现异文并不困难;而要对异文做出合理的判断与取舍,则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经验,更要有方法与学识上的保证。

过去搞校勘的人总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于义为长”或“于义为优”,也就是根据文义表达是否通顺来判断异文的正误。这种取舍标准本身是不太经得起推敲的。判定异文本来是一个辨别“正误”的过程,而“于义为优”谈的却是“好坏”的问题。“正误”与“好坏”是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默认原作品一定就是文从字顺、语言优美的。况且“好坏”的标准因人而异,它过分依赖于整理者的“语感”,而“语感”又是很主观、很容易出错的东西。

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庚辰本《红楼梦》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生儿皆不中用,足的(引者按:此二字被人用墨笔点去)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法名妙玉。

在庚辰本中被人用墨笔点去的“足的”二字,在己卯本中同样是作“足的”,但己卯本的“足”字又被人用朱笔点改为“逼”字;梦稿本、甲辰本、程甲本则作“到底”;蒙府本、戚序本作“促的”;舒序本作“只的”;列藏本作“须得”。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虽然是以庚辰本为底本的,但此处最初却从梦稿本、甲辰本改作“到底”。如果单以“文从字顺”为标准,或者根据大多数人的“语感”来考量,作“到底”当然是“最优”的,而其他几种异文“逼的”、“只得”、“须得”甚至“促的”,也都比庚辰本的“足的”来得通顺。

问题是这个不合“语感”的“足的”到底对不对呢?据陈曦钟统计,庚辰本《红楼梦》中总共出现了七次“足的”,其他六个“足的”的情况皆与上述第十七、十八回的情况近似,即存在“促的”、“足等”、“定的”、“是的”、“真的”等诸多异文。陈曦钟认为,这一切异文,它们所根据的底本,其实都应该是“足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足的”大家都看不懂,于是钞手或整理者就根据语境随机应变,把“足的”改成各种能够通顺的形式;反过来说,不可能有人把散在全书且分见于不同钞本的“到底”、“须得”等等通顺而又好懂的形式,统一地改成“足的”^①。

^①说详陈曦钟:《〈红楼梦〉语言中的一个谜:“足的”——兼谈庚辰本的真伪问题》,《红楼疑思录》,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按: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后,校注本三版《红楼梦》吸收了陈曦钟的意见,不再对“足的”做改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234页。

如果我们借用零度与偏离法则来分析这个问题,可以说,“足的”就是众多异文中的一个“零度”,它好像是旧时杆秤上的“定盘星”;而其他诸如“促的”、“足等”、“定的”之类的种种异文,都是从“足的”讹变而来的,是“足的”一词的“偏离”形态。校勘的任务,就是要从诸多“偏离”形态中发现“零度”,也就是要把秤砣子拨回“定盘星”上,找到那个原始的平衡点。正如王希杰所说,虽然陈曦钟没有说什么零度偏离,“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在众多的偏离形式中寻找那个能够产生出这众多偏离形式的零度形式。”^①

值得一提的是,陈曦钟(熙中)近年所写的《读红零札》、《读〈水浒传〉零札》等一系列文章,其总体思路都在践行零度偏离的分析方法^②。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使一些似是而非的误改得到纠正;文本可靠了之后,过去大家“拿不准”的异文或一些难以解释的字词也有了着落;而且,通过对“零度”的找寻,把这些点点滴滴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时,我们对于《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的版本问题,也可以形成比较具体的认识。比如,通过对上述“足的”一词的考察,不难发现,庚辰本中所保留的“足的”最多,也就是说它的“偏离”最小;从这一点上看,这个本子还比较值得信赖。

二、零度偏离法则在异文分析中的具体的运用

零度偏离法则得以在校勘学中运用的前提之一是,可供分析的异文要比较多,至少也要有三种以上。下面我们要用以举例的《王子年拾遗记》一书,就特别适合用零度偏离的法则来进行分析。

《王子年拾遗记》原名《拾遗记》,是由苻秦道士王嘉撰作,又经梁代萧绮整理、编录的一部杂史。此书已无宋元本传世,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刻本是明代嘉靖年间吴郡顾春的世德堂所刊的《王子年拾遗记》(以下称“世德堂本”)。《拾遗记》又有很多的丛书本,如《稗海》、《古今逸史》、《秘书二十一种》、《汉魏丛书》、《百子全书》及《四库全书》中都收有此书。日本在宝历二年(公元1752年)以《古今逸史》本为底本,也刊刻了《拾遗记》(简称“和刻本”),日本学者还在天头上留下了简单的校语。此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华

^①王希杰:《作为方法论原则的零度和偏离》,第117页。

^②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陈曦钟《说“越性”——兼评“程先脂后”说》,《红楼疑思录》,第11-23页;陈熙中《“残犁”还是“残年”?——读红零札》,《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5辑,第289-293;陈熙中《“搬原”当是“扳援”之误——读红零札》,《文史知识》2009年第10期,第149-150;陈熙中《“割聘”试释——读红零札》,《文史知识》2010年第4期,第129-132;陈熙中《“大客”、“大家”与“火家”——读〈水浒传〉零札》,《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第66-67页等。

书局出版的齐治平的校注本还引用了傅增湘过录的毛扆的校语^①。总的说来，这部书传下来的本子并不少，以往也有学者做过一些校讎的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本子中没有有一个在文字方面是特别完善的。

最近一两年，笔者受山东大学“子书渊海”项目的委托，对《王子年拾遗记》一书重加整理。考虑到这部书的实际情况，我们在校勘过程中也有意识地采取了零度偏离的分析办法。以下拟结合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对零度偏离法则在异文分析过程中有何具体运用，略做阐释。

首先，在广搜异文的基础上，对各种偏离形态进行分析比较，有助于发现之所以产生这些偏离形态的零度形式。《能改斋漫录》中有一段考察“胡饼”得名之由的文字，其实质就是在做异文分析的工作，而其分析问题的思路，恰好就与零度偏离法暗合。

《释名》云：“……胡饼言以胡麻着之也。”崔鸿《前赵录》曰：“石季龙讳胡，改胡饼曰麻饼。”《晋书》云：“王长文在市中啮胡饼。”《肃宗实录》云：“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刘禹锡《嘉话》云：“刘晏入朝，见卖蒸胡饼之处，买啖之。”此“胡饼”皆胡麻之饼也。《缙素杂记》谓张公所论市井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乃易其名为“炉饼”。论此为误，诚然。渠以为胡饼为胡人之所啖，因此得名，故曰胡饼，如毕罗鉴虚，呼物以其名。予谓此失。若曰胡饼非胡麻之饼，则石季龙何以改为麻饼哉？^②

有人说“胡饼”是“胡麻饼”的省称，或又省称为“麻饼”；也有人认为因为是胡人吃的饼，所以才叫胡饼；市面上的人又有称之为“炉饼”的。如果分开来讨论，把“胡饼”说成是胡人吃的饼，或者认为“胡饼”是“炉饼”的音变，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吴曾认为：正因为“胡饼”又有“麻饼”的别名，由此反推，其他两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所以他的论断是：“若曰胡饼非胡麻之饼，则石季龙何以改为麻饼哉？”不难看出，众多名号中，“胡麻饼”是本名，也就是我们要找的“零度”；而其他的种种别名，或者是“胡麻饼”的省称，或者是避讳改称，或者是音变，都是从本名演变来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零度的“偏离”。

类似的例子，在《王子年拾遗记》一书中也可以找到不少。

1. 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汤水德而素王。”（世德堂本，卷三）

①本文引《稗海》用清代李穆堂本，《古今逸史》用商务印书馆影明刻本，《秘书》本用清康熙间汪士汉本，《汉魏丛书》用清王谟本，《百子全书》用清光绪湖北书局本，《四库全书》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文渊阁本（以下称“四库本”），“和刻本”用长泽规矩也解题的《和刻本汉籍随笔》（第十集）之影印本，傅增湘过录之毛扆校语见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本（以下称“毛校”）。下不悉注。

②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方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水精之子”句,《古今逸史》本、《稗海》本、《秘书》本、四库本、和刻本均与世德堂本相同,作“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汉魏丛书》本与《太平御览》卷六九一、《太平广记》卷一三七的引文则作“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①;《孔氏祖庭广记》卷八的引文及“毛校”则作“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②。

这个地方的文字处理比较关键,因为它还直接涉及全句的句读与标点问题。如果按着零度偏离的法则来进行分析,“孫”、“继”、“係”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并不难确认。我们认为三者之中,“係”字当是原文,也就是我们说的零度。“孫”与“係”形近,由“係”而“孫”,所发生的是字形上的偏离。由“係”而“继”,则因为两字同义,属于字音与含义方面的偏离(这里说的“偏离”不一定就是错误)。《尔雅·释诂》:“绍、胤、嗣、续、纂、綏、绩、武、係,继也。”^③《拾遗记》的这个“係”字就应该读为“继”。

我们认为“係”为原文的另一个旁证的是,《佩文韵府》里“绕室”一词的语例,就用的是《拾遗记》中的这句话,但四库本的《佩文韵府》里的引文却作“後衰周而素王”;在《四库全书考证》里馆臣记下了改字的理由:“刊本‘後’讹‘孫’,据《拾遗记》改。”^④可见馆臣也认为这个地方作“孫”字不太讲得通,他们又不知根据了什么本子的《拾遗记》,就把“孫”改成了“後”。馆臣所见的刊本,尽管是作“後”,但显然“後”也是从“係”讹变来的,是“係”在字形上的偏离:由此我们反推原本就应该是“係”。

简而言之,以“係”为零度,则“孫”、“後”、“继”等偏离形态的“致误之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反过来说,如果原文是“继”,则不论从字形还是字音、字义方面考虑,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孫”或“後”这样的异文。

2.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东得葱峦锦柏、漂榭龙松、寒河星柘、岷云之梓……(世德堂本,卷四)

“岷云之梓”,《稗海》本、四库本作“玩山云梓”,《太平广记》卷二二五引作“岷山云梓”,《太平御览》卷一七八引作“岷云文梓”^⑤,《玉芝堂谈荟》引作“岷云之梓”^⑥。中华书局本的整理者齐治平认为“岷云之梓”与上下句法

①以下引《太平御览》据《四部丛刊》三编影宋刊本,引《太平广记》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悉注。

②《孔氏祖庭广记》卷八,《四部丛刊》续编影铁琴铜剑楼藏蒙古刊本。

③《尔雅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下册,第2569页;参齐治平校注:《拾遗记》,中华书局,1986年,第70-71页。

④《四库全书考证》卷七十《子部·佩文韵府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万有文库》本《佩文韵府》卷九十三下字作“孫”,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册,第3589页。

⑤按:四库本《太平御览》作“岷云文梓”;《四部丛刊》本《太平御览》句作“东得葱峦绵柘、漂榭龙杉云梓寒河星柘”,“云梓”上疑脱二字。

⑥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不一律,故据《稗海》本改作“玩山云梓”。^①

按:此处字当作“岬”,《类篇》:“岬,崒山貌。”^②“岬”是山高峻的样子,“岬云”就是高耸入云。由于“岬”字不常见,钞手便误钞为“岬”;或者又有整理者妄下己意,改作“岬山”、“玩云”等种种形式。前者属于无意识的偏离,后者则是有意的妄改;而以“岬”为零度,这些偏离的形态又都可以贯穿起来。

3.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宵。(世德堂本,卷七)

“咽”,《稗海》本、四库本作“噎”,《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作“噎”。按:“咽”有堵塞之意;如《通鉴》卷一一九:“宾客辐凑,门巷填咽”,胡三省谓:“史灼《释文》曰:‘咽,音因,塞也;本作噎。(费本同。)’余谓咽,一结翻,亦以咽塞不通为义。遍考字书,咽字无音因者。”^③因此世德堂本此处作“咽路”并无不妥;在读音方面,不读“咽喉”的“咽”,而读作“哽咽”的“咽”。不过,在表示阻塞这一含义时,“噎”比“咽”更为常见;如《三国志·吴志》卷五十八:“(周)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④简言之,“噎”与“咽”是音近而意同,而“噎”与“噎”则属于形近而讹;三者之中,“噎”为零度。因此,尽管世德堂本作“咽”不误,但我们可以推测,再往上追溯,更早一点的本子应该是作“噎”字的。

其次,对众多异文进行互相推求,弄清其偏离的轨迹之后,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同版本之间的承传关系。

1.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卫足,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难萎,芬馥之气,彻十馀里……(世德堂本,卷六)

“难萎”,《稗海》本、四库本作“难萎”,《汉魏丛书》本、《百子全书》本作“葳萎”,《广群芳谱》引作“虽萎”,《太平广记》引作“杂萎”。齐治平认为:“按《诗·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传:‘阿然,美貌;难然,盛貌。’陈奂传疏:‘阿难,连绵字,《莠楚》曰猗儺,《那》曰猗那,声义皆同也。’此‘难萎’疑亦连绵字,美盛之貌。又,解作不易枯萎亦可。”^⑤这段解释颇嫌首鼠两端,如果“难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不易枯萎”,那么前面也就不必再赘引《诗经》的那些注疏了。

①齐治平校注:《拾遗记》,第103页。

②司马光等《类篇》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影姚刊三韵本),第332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8册,第3741页;《通鉴释文辩误》卷五,第20册,第73页。

④《三国志·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5册,第1351页。

⑤齐治平校注:《拾遗记》,第129页。

在众多的异文中,首先可以排除的应该是“葳萎”。据《康熙字典》,“萎”可以通“蕤”,如果是“葳蕤”,意为“盛貌”^①,即草木繁盛之状,用在文中,意思上可以讲得通。但从形态上看,“葳萎”绝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零度。因为其他四个异文在字形方面都有一目了然的相似性,而与“葳萎”的字形相去甚远,我们很难想象这四个异文能从“葳萎”派生而来。

剩馀四者中,最能解释得通的是“離萎”。“離萎”即“猗萎”;郭璞《江赋》:“随风猗萎,与波潭沲”,注云:“皆言草也。猗萎,随风貌。”^②“離”与“猗”,同为“支”韵平声(“猗”,《广韵》作“於离切”^③),音近而通。“花叶離萎”就是花叶随风摇摆的意思;正因为随风摇摆,所以才能香彻十馀里。

如前所述,在现存众本中,世德堂本的年代最早,但世德堂本中这个字又是错的;而在时间上比世德堂本晚出的《稗海》本,却提供了正确的文字,说明《稗海》本另有可靠的文字来源。而“雖萎”、“雜萎”、“葳萎”等异文则是世德堂本的“難萎”继续开枝散叶的结果。(这时我们可以把“難萎”视为又一个零度,这里说的“零度”不一定代表正确。)在原本的“難萎”讲不通而又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本子的情况下,编校者就不得不靠私见来做改动。这样臆改的结果是在字形方面多少“遗传”了原先的形态,但意思上仍不免似是而非。至于“葳萎”,这一改动的幅度最大,改得也最“通”的;可是最“通”的,对原本的偏离也最远。这也说明,有时候太“聪明”而又胆子大的人是不太适合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

2.董賢以雾绡单衣,飘若蝉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裾,故使宛转便易也。(世德堂本,卷六)

“筵卿”,《稗海》本、四库本作“賢卿”,《汉魏丛书》本、《百子全书》本作“賢更”,“毛校”作“聖卿”。按《汉书·佞幸传》:“董賢字聖卿。”^④齐治平认为:“毛校”作“聖卿”近是,“但前既直书董賢名,未叙其字,此不应忽称其字”,故齐治平倾向应从《汉魏丛书》本作“賢更”。^⑤

齐治平认为“聖卿”近是,又认为“賢更”可从,这显然是以是否合乎史实、文句是否顺畅作为取舍异文的标准。但如果把这些异文,或者说偏离形态,综合起来分析,就可以发现问题并非如此。“賢”字在《广韵》里属“先”韵,“筵”字属“仙”韵^⑥,这两韵在诗韵中是同用的,也就是说声音非常近似。古人

①《康熙字典》申集“艸部”,中华书局,1958年,第1041、1046页。

②《文选》卷十二《江海》,《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

③《宋本广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④《汉书》卷九三《佞幸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33页。

⑤齐治平校注:《拾遗记》,第140-141页。

⑥《宋本广韵》,第37-38页。

校书,有时是一个人朗读,另一个人核对,即如刘向所说:“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①钞书的情况也类似,很多时候不是“看着钞”,而是“听着钞”(“听着钞”的好处是可以一人念、多人钞,同时钞成好几份),所以声音相近的字就很容易听错、钞错。我们认为,“筵卿”当为“賢卿”之音讹;至于“聖卿”、“賢更”这样的异文,其依据的底本也应该是“賢卿”,是整理者在没有搞懂“賢卿”一词的确切含义的情况下,以“賢卿”为起点,做了一些加工和改动。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再返回原来的起点,也就是我们说的零度;看看这个零度能不能讲得通。“賢卿”可以理解为哀帝对董賢的爱称。以“卿”为爱称或尊称,这在古汉语中常见。《康熙字典》引《韵会》曰:“秦汉以来君呼臣以卿。”颜师古注《急就篇》“赵孺卿”曰:“孺,幼少之号也;卿言可为列卿也。”^②

与前一个例子反映出的情形一样,《稗海》本的文字是正确的,这也说明《稗海》本与世德堂本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因此这两个本子是应该逐字对校的。相比起来,《汉魏丛书》本中,属于编校者臆改的地方稍多,对原本的偏离也更远一些。

3.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世德堂本,卷六)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稗海》本、四库本作“吹杖端灿然大明因以照向”。《太平广记》卷一六一引作“吹杖端灿然火明因以照向”,卷二九一引作“吹杖端灿然火出因以照向”。《太平御览》卷七一〇引作“吹端火出具以照向”^③;《古今事文类聚》引作“杖端出火用以照向”;《玉海》引作“乃吹杖端烟,因授向五行洪范之文”;《绀珠集》卷八则引作“吹杖端焰燃”;《锦绣万花谷》所引此句与世德堂本同^④。

排比这几种异文,需要梳理的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老父吹的是“烟”还是“火”?从常理分析,火不能吹,火苗一吹就灭;“烟”倒是可以吹出火来。老父的杖头上一定是有“纸煤”一类的东西,需要光亮或用火的时候,可以随时

①语见《太平御览》卷六一八《正谬误》条,《四部丛刊》本。

②《康熙字典》子集“卩部”,第160页;《急就篇》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9页。

③此据《四部丛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吹杖端火出燃以照向”。

④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三,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影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第4册,第2999页;朱胜非《绀珠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上海书店,1992年(影明嘉靖刻本),第169页。

吹出火来。《紺珠集》的引文作“焰”字,实为“煙”之音讹,由这个误字也可以旁证老父吹的是“煙”,而不是“火”。第二,“灿然大明”或“灿然火出”又当怎么看?综合几种异文,不难得出结论,《稗海》本与四库本中的“大”字,当为“火”字之误(“大”与“火”是版刻中常混的字)。这句话在宋代类书中,几乎找不出一模一样的两句引文。由于类书的编者没有搞清楚吹的是“煙”还是“火”的问题,怀疑原文有错,于是就根据大体的句意,把原文“意引”或者“概引”了下来(因此校勘中过分倚重类书引文,是很不可靠的)。在众多引文中,《稗海》本的文字与《太平广记》所引的近似,世德堂本的文字与《锦绣万花谷》相同,这也可以证实我们前面所说的,两个本子各有不同的来源。

复次,零度偏离法则还特别有助于分析原书中避讳字的使用情况。古书中的讳字,如果是缺笔或者空字的,读者看了以后心知肚明,一般不会引起误解;比如世德堂本中的“轘”、“殷”、“筐”、“徵”、“頊”、“祜”等字,皆避宋讳而缺末笔,说明这个本子还保留了比较多宋本的痕迹。但讳字如果是用改字的办法来处理的,有时就很容易被看出来。

1.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以成渊,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软,男女饮之则淫。(世德堂本,卷五)

2.(屈原)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世德堂本,卷十)

例1中的“淫泉之浦”,《稗海》本、四库本作“淫渊之浦”;“以成渊”,《稗海》本、世德堂本作“以成渊泉”。《太平广记》卷二二五引了《拾遗记》中的这一条,正文中作“淫泉之浦”,标题则作“淫渊浦”。例2中的“水”字,《稗海》本、四库本及《太平广记》卷二〇三的引文并作“渊”。如果我们只是一对一地来看这些异文,作“渊”、作“泉”,或作“渊泉”、“水”,放在文中都可以讲通。但综合起来看时,不难断定,这几处文字都曾有过避讳,原本应当一律是作“渊”的。

按照《管子·度地篇》的说法,“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①;《拾遗记》中的淫渊(或淫泉)“其水小处可滥觞褰涉,大处可方舟沿泝,随流屈直”,比一般性的泉源要更深、更大一点,名为“淫渊”更为合适;《太平广记》的标题也可以从旁说明这一点。至于“清泠之渊”,则是古书中的常语,如《庄子·让王篇》中就有“自投清泠之渊”的说法^②。《拾遗记》中因避唐讳而改动的这些“渊”字,有的本子后来回改了,有的本子则没有回改;或又不明所以,在回改的时候,改出像“渊泉”这样的字眼;而避讳则是产生这些偏离形态的总因。

3.(低光荷)芬馥之气彻十馀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世德堂本,卷六)

①《管子》卷十八,《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第5册,第304页。

②王先谦:《庄子集解》卷八,《诸子集成》第3册,第193页。

“益脉理病”，《稗海》本、四库本作“益人肌理”，《三辅黄图》引作“益脉治病”。如果我们只做“对校”，“益脉理病”与“益人肌理”只是意思上有些微差别，前者强调养生，后者侧重美容，难以区分孰是孰非。但如结合《三辅黄图》中的异文，疑问便涣然冰释，“理”字实避唐高宗李治之讳，原本就应该是作“益脉治病”的。从“治病”这一零度出发，有的本子改“治”为“理”，从而又衍生出“肌理”之异文。

三、零度偏离法则对校勘学的意义

从逻辑上说，异文之间的关系无非三种：一是在众多异文中，有一个正确，其他都是错误的；二是所有异文都是错误的；三是所有异文都是正确的（比如二者之间是异体字、通假字的关系）。但总体上看，校勘中发现的异文还是错误的居多；既然叫做异文，至少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偏离。那么提供了错误异文的本子在校勘中还有没有价值呢？结合我们前面的分析，答案是肯定的。

《涅槃经》里讲过一个“众盲言象”的故事，为人们所熟悉：

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牵一象，以示盲者。”时彼众盲各以手触，王问之曰：“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①

这些“言象”的盲人，没有一个说的是对的，他们的问题主要出在“不全面”。但他们暗中摸索的工作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众盲口中的象，虽然与实际各有出入，但都说出了象的局部特征；就像佛经里说的：“如彼盲人，各各说象；虽不得实，非不说象。”在这里，象就是零度，而众盲各不相同的描述则构成了零度的偏离；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这些偏离形态综合起来看，不难猜想，能同时满足“如芦菔根”、“如箕”、“如石”、“如杵”、“如臼”、“如床”、“如瓮”、“如绳”的动物，也只能是象。

校勘工作的道理也是如此。正确的文本，有时恰恰就蕴藏在众多偏离的形态当中，需要整理者去拼凑，去反推。古籍整理领域的“校勘”相比出版工作中的“校对”，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校勘古书实际上找不到一个百分之百正确、可供最后核对的“定本”。要整理出一个相对完善、较少错误的本子，也即我们所说的零度，正是要参合了各种偏离形态之后，才能最终推求出来。古语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②，这是因为韩信治军有方；从事校勘工作的人，也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才能更好地驾驭、分析众多的版本与异文。

【作者简介】林嵩，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古籍整理。

^①自《子史精华》卷一〇八《释道部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典出《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628页。